

《孙中山研究论丛》第 14 集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 4

ISBN 7-306-01531-1

I. 孙… II. 中… III. ①孙中山—革命理论—体制改革—
研究 ②政治思想史—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D092 ②
D693.0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 84037215)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英德人民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英德市英城浣阳一路25号 邮编:513000 电话:0763-2222856)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50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定价:20.00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林家有 (1)
孙中山与清末驻日使臣	李吉奎 (20)
孙中山与俄国民粹派关系述论	李玉刚 (47)
论 1924 年孙文访日 ... [日] 藤井升三 李吉奎译 [马宁] 校	(76)
古老的理想与维新的意义——试论 19 世纪后期的 大同思想	吴义雄 (103)
汪康年对《时务报》、《京报》的经营及其人际关系 ...	周 元 (125)
清代广州文澜书院	黄海妍 (149)
严复的近代教育变革思想 (1895—1911 年)	毛剑峰 (165)
清末报律颁布前后的报界反应	王学珍 (191)
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尚武主义	何文平 (208)
晚清变革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学部	关晓红 (233)
清末民初法政专科学校教育	安新予 (252)
邹容的《革命军》在革命救国事业中的时代意义 ...	王禄斌 (290)
民国初年的广东社会教育	姚 刚 (306)
《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的文化论战	祁森林 (338)
谭延闿系湘军与广东革命政权 (1923—1926 年)	刘高葆 (357)
胡适与全盘西化思潮——兼论全盘西化思潮评价 中的几个问题	赵立彬 (402)
评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	郭华清 (428)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林家有

民族主义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民族主义？这是一个相当旧的课题。然而，由于世界局势的演变，民族主义又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通过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年（清末民初）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特征的考察，论证民族主义的功能，旨在说明民族主义不能只理解为一种强烈的情绪，而且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和意识。通过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作个案分析，阐明民族主义虽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好，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文化的积淀，它必然具有不可抹杀的对内和对外两重意义。当然，民族主义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对待民族主义思潮要作具体分析，不能采取简单的方式，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彻底骂倒。

本文要重点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民族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我认为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二律背反。

一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萌发于 19 世纪末，形成于 20 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也是国内清朝政府对各族人民实行民族压迫的结果。所以，它是国内各族人民共同反对清政府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

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副产品”^[1]。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救国的力量，作为民族凝聚的核心和民族振兴的精神，它不仅具有民族的动员作用，而且也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过程中关心国事，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通过进步刊物的传播和革命者的宣传逐步形成和鼓动起来的。他们通过各种传媒“述英雄之伟业，借文字为鞭策之资；伤祖国之沦亡，发大声以醒同胞之梦”^[2]，广泛深入地进行“保国保种”的爱国主义宣传。他们在宣传中着重告诉民众说：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衰弱，使“吾数千年神明之胄，也将迫之于山之巅、水之涯，行将尽其类而后已，环宇虽大竟无容足之区，病将死矣，曾不知其病之所在死之所由”。由此，他们感叹地告诫国人：“呜呼，今吾不再拭一掬泪以为吾同胞告，则吾恐终为所噬而永永沉沦万劫不复也。乃言曰：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3]可见，民族主义是在救亡的思想指导下，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的。

至于什么叫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有人说：“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国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4]

有人说：“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具同一之知觉，既相亲比以谋生活矣，其生活最大者为政治上之生活，故富于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国家之主义，此之主义名民族主义。”^[5]

有人说：民族主义“是说一族有一族的界限，不该拱手让人，那异族胡儿，妄自称尊的，定要把他一举扫荡的了。”^[6]

还有人说：“民族主义者，复仇主义也。”^[7]

以上这些都从族类观念去概定民族主义的涵义，目的都是论

述民族主义是革命的必要，也是建立和巩固民族国家的必要。

由此可见，20 世纪初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在“排满”反清这个具体的条件下发生的，但它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 20 世纪东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建立和巩固民族国家、争取政治经济独立和发展社会文化的进步思潮。它的发生发展过程，决定了中国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参与形式和在文化上的结构模式，成为东方社会发展的主要文化因素。^[8]

民族主义如果作为一种思潮，它便包涵民族的政治信仰、情感、思维方式和伦理价值观等内容；如果作为民族的文化意识，它就被一个国家或民族大多数人认同的一种深层的观念。一是表现为对本民族的认同，一是表现为对其他民族的态度。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东方政治民族主义，它主要的表现是特别重视民族意识，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中国与外国民族平等。然而，奇怪的是，作为三民主义政纲和革命学说的创始者孙中山，在 1905 年宣布他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时，他只是说：“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他并没有就民族主义概念作明确界说。他不去强调民族主义的重要，倒是强调“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9]。这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不是单纯的“排异族”，而且同建立民主共和政制的民权主义相结合，带有明显的反对内外民族压迫，结束“异族残之”、“外邦逼之”的生存环境，实现民族平等和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理想。所以，他反对种族复仇。他说：民族主义“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的”；“满洲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洲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者当作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但是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

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他强调，“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10]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反对“满洲民族”主政，从根本上说，是由谁来掌握国家的政权，推行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所以，他鼓动民族主义是为了倾覆清朝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恢复中华”后，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什么叫民族主义？在1924年以前，孙中山一直没有界说。这可能是与孙中山是从政治学方面去使用民族主义，不是从学理上去理解和阐释民族主义有关系，所以他不太重视概念。但照我的理解，最主要的原因是孙中山不便于说，而不是孙中山不能说。如果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开始宣传民族主义算起，直到1924年1月孙中山开始系统讲演三民主义时，他才开始界说民族主义的概念，其间历经将近20年，说明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态度非常认真，也说明他对于同时代的许多革命者，乃至学人关于民族主义的界说，不一定同意，但他采取只要有利于动员人民起来反清和反对列强侵略，就让他随便说去的宽容态度，不加任何干预，也不明确表现自己的态度。到了晚年，因为要系统宣讲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思想，让国民党员和国民全面、系统、正确地了解和掌握他的理论，他才不得不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个阐释。

孙中山说：“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因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什么是国族主义呢？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11]。这个解说不仅跟中国的历史实际不符，而且也十分模糊，故不能认为是一种科学的界定。

所以，民族主义是一个涵义十分广泛，又没有明确界定过的一种思想（或思潮）。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不同的环境，它必然有不同的追求和表现，因此，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抑或不同民族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不能一概而论。

据高雄中山大学姜新立教授的研究，他认为民族主义的类型非常多。他列举了下列种种，指出：怀庭（W. Whitnem）类型有“开放的民族主义”（Open Nationalism）和“封闭的民族主义”（Closed Nationalism）。哈斯（Ernst B. Hass）从现代史着手，提出七种民族主义意义类型，其中四种属革命性的民族主义，三种属兼容性的民族主义。埃特（Peter Alter）在 *Nationalism*（1900）一书中又将民族主义分为重生的民族主义、革新的民族主义、集合的民族主义。此外，普拉米那兹（J. Plamenatz）认为，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故他把民族主义分成西方型文化民族主义和东方型文化民族主义。而卡明卡（Eugene Kamenka）则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所以，他认为只有政治民族主义，没有其他元类型。相反，约翰逊（Harry G. Johnson），则从经济学出发，认为只有经济民族主义，而无其他元类型。^[12]然而，西安西北大学的彭树智教授在他的论著《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从政治文化的概念去界定，他认为民族主义可分为西方民族主义和东方民族主义两种类型。他在书中提

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波鲁克·L. 穆塞尔博士在中国讲学时，以非洲民族主义为例，认为仅是非洲民族主义就有四种：阿拉伯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本地民族主义。^[13]正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种种表现，有的学者便将民族主义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总之，在这种类繁多的民族主义中，有一些并不都是排外的、封闭的。而且民族主义、尤其是东方民族主义属于殖民地民族主义范畴，它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下刺激起来的，所以它具有防御性。它为民族或国家的主权而呼喊，强调民族本身的优越，强调民族文化的传统，强调民族的自尊、自信，具有强烈的凝聚力。这种民族主义显然不是排外的，而是为了防御侵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因而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所以，对待各种民族主义要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理解、去审视，采取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肯定哪些内容和表现，又否定哪些内容和表现，歌颂哪些民族主义，批评哪些民族主义，都离不开提倡民族主义思潮的具体人的思想倾向。正如清末革命者所言：如果通过鼓吹民族主义达到建立民族国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若通过鼓吹民族主义去消灭其他民族的国家，这是必须防止的。因为只有“民族的国家，乃能发挥其本族之特性；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国家之目的，则合人民全体之力之志愿，以谋全体之利益也”。民族不能统一，“则不能成国”，“国不能统一则不复成国”，所以“民族主义者，对外而有界，对内而能群者也”。“内力不充，自相离乱，而适以处民族膨胀压力最盛之时代，是犹复空杯于水，而欲水之不入其中也，其可得欤！”^[14]对民族主义作这种申说，我认为是相当理性的。所以，对清末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应作冷静的思考和分析。此外，民族主义作为国际政治学上最模糊的理论概念，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现实追求不同，因此，

民族主义的类型和特征也不一样。凡此种种，便“成为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鲜课题”^[15]。因此，加强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并对其作出正确和合理的评估，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的问题，而且也是现实社会的重要问题。

二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属于什么类型？有人说是“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有人说是在外患折辱下，“中国社会亟思摆脱贫弱寻求富强的民族主义”；有人说是与“革命排满”同义；有人说是“传统的民族主义”；有人说是为建立民族国家，集中全力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政治民族主义”；有人说是“文化民族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的混合物”；有人说是混合了对欧洲的羡慕、怨恨和恐惧具有“双重意义的民族主义”；有人说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东方民族主义。还有种种，不一而足。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歧异？这主要是因为有的学者只看到孙中山民族主义表层的形式，而没有从他的言论和行动中去窥伺它的深层意识。从表面上看，孙中山在开始从事反清革命时，的确提出“驱除鞑虏”“排满”的口号，而且还讲过满族入关建立清朝政府是中国“亡国”，“驱除鞑虏”是为了“光复汉族”，建立汉族的国家。如果单纯地从这些言论去看，孙中山明显地存在族类民族主义思想。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但鼓吹族类民族主义，它的消极影响是在民族之间造成情绪化的不信任感，会激化民族之间的矛盾，产生疏离行为。对于这一层面的危害，应该说，孙中山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同盟会成立后，民族主义思潮盛极一时，引起了社会的全面反响，有赞成，有反对，也有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所以，在孙中山发动南方滇、桂、粤各省国民起来反清起义时，便遇到在这几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如何

处理各个民族之间关系的突出问题。经过思考，孙中山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宣传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绝不能是建立汉族的民族国家，而应该是建立“中华民族”的共和国，用他的话说是建立一个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族国家。所以，正如鲍绍霖先生在他的专著《台独幕后——美国人的倡议与政策》一书中所说：近代中国人目睹自己的国家遭受殖民列强的瓜分。他们鼓吹民族主义的目的是“在于民族图存，最为紧迫的是摆脱外国剥削，实现领土完整，而不是建立众多的民族小国”^[16]。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兴起，“它意味着在反抗外国侵略中唤起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孙（中山）和中国的其他知识分子都主张民族主义，这不仅因为他们不满于满洲人的统治，而且因为民族主义可以使他们摆脱落后少数民族的专制枷锁，焕发汉人的活力。”^[17]孙中山晚年在民族主义讲演中强烈地指责帝国主义列强推行“世界主义”政策，运用强权政治去侵略别的国家，弄到全世界不得安宁。但他在讲演中又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视为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并表示要将欧美各国已往的历史作为教材教育全国人民认识：振兴民族主义是为了改变国家的衰弱，我们要振兴中华，但也不能去消灭别的国家和民族。所以，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平等。他不是为了复仇，更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汉族人的政权，也不是为了振兴中华去侵略其他国家。所以，孙中山鼓吹民族主义的潜意识是为了结束“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8]。基于此，我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中西文化经过复杂化合作用的产物。他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族意识和吸收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来创造自己的民族主义学说，并确立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正因为

这样，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情况，也反映了亚洲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强烈愿望。所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属于东方殖民地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范畴。它是指导中国和东方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进步思潮。^[19]这种思潮不仅对内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坚持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且对外也坚持“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0]，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束被帝国主义侵略之历史，免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绊”^[21]。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爱国、革命、建设和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富强的时代主题，因此，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并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唤醒了中国，鼓舞了几代中国人。^[22]应该指出，近代中国也曾经存在过族类民族主义的分裂活动，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倒退行为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自我保护封闭现象，但它始终都只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支流，成不了主流。只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革命派所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在维护中国的尊严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原则下，坚持改革的方针，为实现振兴中华确立了理论基础，充分展示了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时代风貌。毫无疑问，只有这种民族主义才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23]。

那么，为什么只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呢？那是因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符合中国人的心态，体现了文化调和和交融的实际。谈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指出的，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复古的，保守的”，一方面是“革命的，是学西方的”。所以孙中山是孔夫子的信徒，也是基督的信徒。^[24]正因为

它是“复古的，保守的”，所以他具有“华夷之辨”的“族类”观念，他坚持汉族文化的优越地位，强调以汉族作为凝聚的中心，不承认在总体上汉族有向其他少数民族学习的必要性。这种华夷等级秩序观念与新时代的国际秩序以及外交准则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与冲突发生在古老的封建帝国——中国与新兴的资本主义殖民帝国——西方列强之间，标志着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总决战的开始。然而，孙中山毕竟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不完全相同。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构成了相对稳定的格局和稳定的体系，所以，他认为应该弘扬自己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强调要继承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固有的能力”，并发扬光大，让其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然而他也不认为，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所以，他认为中国也有向西方先进国家借鉴和学习的必要，这种心态便使孙中山对中外文化采取调和择优而取、优势互补的态度。因为他具有“革命的，学习西方的”内涵，因此，他又反对极端排外的华夏中心主义，主张开放主义，向外学习，取法乎上，表现出他具有兼容并包的民族文化观，具有主动地积极地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特征。他指出：如果一个民族实行自我封闭政策，这等于民族的自杀。正因为过去中国“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由于孤立自大，由来已久，“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要进步，社会要前进，国家和民族要富强，就必须采取“开放主义”政策，改变中国“荒岛孤人”地位，否则，中国的一切振兴都无成功之可能。他指出：只要改革我们的思维方式，举国一致，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

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所以，“治本为先，救穷宜急”^[25]就成为孙中山利用民族主义实现求强求富的基本主旨。孙中山将民族主义视为“救国主义”，既包涵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意义，又具有发展中国经济和文化教育，“学欧美之所长”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潜在意识。所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他的突出贡献，它不仅概括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进步，也初步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族类民族主义思想的破坏性使命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议性使命，为解决近代中国民族问题提出了不少带有创见的原则和政策。

总之，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领袖，他把反映民族情感的民族主义同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反对外族压迫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宣传民族主义，实现了避免殖民主义瓜分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的，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又由于他具有国际主义和“天下为公”的互助思想和精神，也给亚洲人民极大的鼓舞。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他留给中国和亚洲人民一笔珍贵的遗产，继承这笔遗产不但不会使中国走上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妨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反而对于重振亚洲雄风，全面振兴中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由于苏联的解体、东欧和中东及其他一些地区民族分裂战争的加剧，1989年以后常被人们称作后冷战时期的开始，民族主义再次兴起，并已成为当前最令人关注的思想潮流。在中国的两岸三地（内地、台湾和香港），民族主义也成为热门的话题。

应该如何看待民族主义思潮？本文前面通过对19世纪末20

世纪初年（清末民初）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内涵和特征的考察、论证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功能和历史使命，以及它所起的作用和应该注意的问题，给我们很多启示。

第一，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民族的深层意识，它是团结和维系民族团结和统一的精神纽带，具有不可抹杀的对内和对外两重意义。但是，狭隘民族主义带有分离分裂的倾向，属于一种封闭的、自我阻隔、激化仇外情绪的意识，存在明显的消极影响。所以，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不宜过多地强调民族主义，只能强调爱国主义。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而又有联系的概念，民族不等于国家，民族主义也不等同于爱国主义。民族是人们的共同体，国家则是管理人们的统一机构。民族主义是民族的意识 and 行为，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所有民族对国家所表示的一种深厚的情感和奉献精神。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有部分与全体之区别。中国除了主体民族——汉族之外，还并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如果用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中华民族来代替中国，虽然不十分恰当，但从宏观上看，大体上可以说是符合实际的；但以汉族代替中国这就不对了。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比如他说：“合汉、满、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犹是一族”，又比如，他说：“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所以，他指出按照中国历史上的习惯情形讲，“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26]。他还指出：过去中国人最崇拜的就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因此，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而现在国家面临着各种危机，为了救国必须提倡“国族主义”。国族主义，也即民族主义。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等于“国族主义”，等于“救国主义”。这是孙中山从各个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的视角去谈论民族主义，但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在近期内不仅不可能融合为一个民族，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各民族也不可能自然融合为一个民族，因此，孙中山的国族主

义构想也只是一种虚幻、缺乏实际意义的东西。所以，他的民族主义其实不等于国族主义，但是可以说是救国主义。救国主义当然也可以说是爱国主义，但民族主义也不能等同于爱国主义。因为中国的情况很特殊，对外而言，代表中国的是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又包括许多小民族（如汉、满、蒙、回、藏、苗、瑶、壮、高山等族），汉族有汉族的民族主义，少数民族也有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所以，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民族主义应该是爱国主义，但也不一定是爱国主义。所以，只讲民族主义，不讲爱国主义，容易造成误解，会助长狭隘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生成，影响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因此，我们只能强调爱国主义，不宜过多地提倡和强调民族主义，只能将爱本民族与热爱本国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祖国结合起来才是正确的导向。在中国，民族主义不等于国族主义，也不等同于爱国主义。每一个民族都应有它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更加重要的是，要具有深沉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的观念，不论哪一个民族的成员都应该有国家的观念，并树立爱国主义精神。我不同意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看作是传统民族主义的陷阱”的看法，相反，我倒认为在我们这个多元统一体的民族国家里，必须牢牢地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维护祖国的统一。所以，爱国主义是永恒的主题。如果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没有爱国主义作为联结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势必会造成国民无所依托。国民爱国心重者其国强，反之则弱，国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没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它就会有疏离感，产生离心的倾向。我们应该像孙中山一样，在中国确立民族主义，就是要在在中国确立统一国家的观念；在中国宣传民族主义，就是在中国宣传爱国精神。孙中山不仅把争取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作为自己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与活动的出发点，而且还把中国的独立解放与保护、扶助邻近国家和弱小民族作为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孙中山是中国

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他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把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区别开来。国际主义根植于民族主义之中，民族主义包含国际主义。这就表明，孙中山充分意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险，并在晚年作民族主义讲演时，将民族主义定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回失去的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平等，并将其作为最终目标。这就把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代表了 20 世纪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

第二，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到问题，成为当今人们议论的焦点。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对抗的，要搞现代化就不能有民族主义。^[27]他们担心民族主义盛行会形成文化保守主义的强大势头，造成盲目排外，潜伏着危险的倒退。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民族主义势必造成民族自我中心文化滑坡的危险形势，不利于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促进中国的发展。我认为，现代化建设与民族主义是不矛盾的。因为现代化建设尽管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向，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符合本国社会的建设计划，创立自己的建设模式。而且每一民族的现代化建设都必须以自己的力量为主，以外力为辅，所以现代化建设必须以我为中心，首先靠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要学习一切先进民族的科学技术和文明业绩。只有增强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氛围，才能产生强大的动员力量，才能形成保卫民族生存和为民族振兴献身的民族精髓；也只有以我为中心才能正确地对外开放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传统文化不一定都不好，外来文化不一定都先进，也不一定都符合中国的国情。开放不等于不加分辨地将外国的文化照单全收。有些外国的文化可以学，有些则不能学，有些外国人提倡的价值观可以认同，有些则要保留。因此，对一些文化接受与否，首先要有深入的了解，其次要有筛选。但是，选